

邓初民参与新政协的历史回忆

张原



邓初民

政协记忆

本文作者整理了邓初民多份未刊的个人资料、家人的口述实录，参照多位同期与他有所交集的历史人物史料和人民政协的公开资料，对邓初民从响应“五一口号”到新政协会议召开这一时期主要的历史活动和重要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忆，其中多有首次刊出的史料和生动的历史细节，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75周年。

鼓与呼：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向29位民主人士发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邀请，邓初民亦在受邀之列。其后，中共又连续两次发出更大范围的邀请名单，邓初民都位列其中。从“五一口号”到新政协会议召开，邓初民是这段历史的一位重要参与者、亲历者。

5月8日的日记中，邓初民写道：“二时起来，过海到海陆通旅馆，访张克勤弟，应邀赴《华商报》座谈会，到有马夷老、郭沫若、翦伯赞、章乃器、张香老、王却老、黄药眠、狄超白、章汉夫、连贯、张殊明、王雨亭、黄水清诸氏，由刘思慕兄主席，说明为适应新形势关于中共‘五一号召’，希望诸位赐教，发言者有郭、翦、马、章及我诸人。”这段文字记录了《华商报》为响应“五一口号”召开的一次高层座谈会的情形。

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领导与民主人士的商谈事实上已有铺垫。此前两日，在沈钧儒家中，由沈老主持，邓初民与胡愈之等民盟成员召开了关于民盟今后工作的商讨，这次谈话还邀请了连贯、潘汉年参加。连贯特别指出民盟现在应统一到当前的政治方针上来，这也为后续新政协的协商工作奠定了基础。华商报组织安排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很快就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随后，邓初民连续几日投入写作，迅速完成了第二次座谈会的讲话稿，此文正是大家熟悉和经常引用的《怎样响应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连贯、方方、黎澍等大都为邓初民多年的旧识和好友。在集体讨论之外，他们曾多次与邓初民单独交流，深入沟通，有时在邓初民家中，有时在民主人士的聚会上，他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各个不同的场合。6月4日，邓初民与柳亚子、茅盾等125位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声明中他们说“新的政协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

“五一口号”发布后，政治形势仍极为复杂，团结民主力量、凝聚政治共识就成了极为紧迫的任务。邓初民积极参与何香凝、沈钧儒、李济深等组织的民主党派活动，利用社会影响开展对部分国民党将领、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联系国内进步力量，他们审时度势，推动民主力量的凝聚和扩大。与此同时，邓初民还有力的

学说和洞察为新政协争取舆论支持，与中间道路展开争论。

1948年8月，邓初民接受《新生晚报》记者刘粤生等人的访问。记者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中共号召召开新政协，是否决心放弃了独裁；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及其必要性、重要性怎样。邓初民精辟的论述深深地感染了记者，采访结束后他们说给自己上了一课。在这场舆论斗争中，邓初民对新政协会议进行系统论述，先后发表了《新政协的任务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新政协与领导权及统一战线问题》《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章，并与郭沫若等人出版了专刊《论新政协》，对新政协的关键问题予以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应。

邓初民与多家海外报刊保持着密切联系，为进一步赢得支持新政协的国际舆论，他还为纽约的《华侨日报》等报刊撰稿。

安全北上：协商建国

1948年12月26日，在中共安排下邓初民等第三批民主人士踏上了北上的路程。由于前期民主人士离港已被香港政府和特务注意，此次行程更加危险，也加大了护送难度。登船前，夏衍、周而复宴请了彭泽民、邓初民、茅盾夫妇、施复亮、孙起孟、洪深、章乃器一行。深沉的夜色中，他们有序靠近停泊在码头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片刻，朱蕴山、梅龚彬、孙茂荪偕李济深同来，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顺利登船。漫漫长夜，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他们终宵未眠，静静等待轮船开出码头。27日清晨，直至轮船驶离离海口，他们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轮船上度过了近半个月的时光，也在船上迎来了1949年的新年元旦。当晚，他们举行了热闹的新年酒会，船长、船员与他们举杯同庆。茅盾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纪念册请大家签名留念，邓初民则请诸位在他的日记本上签名，留存下这段珍贵的记忆。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

崔鹤同

在艰苦中笔耕不辍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为应付变局，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并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当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因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师们入不敷出，有的人只能靠卖字卖文维持生计。为此，西南联大的部分教师还曾组织了一个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的合作社，冯友兰也列在卖字的行列中。闻一多善刻图章，为了帮助冯友兰卖字，他还特意刻了两枚大印章以备使用。即使这样，冯友兰的基本生活也难以维继。

艰苦的岁月、颠沛流离的生活，并

没有妨碍冯友兰的哲学研究。相反，民族的兴亡与历史的变迁反倒激励了冯友兰的写作热情。他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将近10年的蹉跎困厄中，创作了六部传世之作，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行》，他统称之为“贞元之际所著书”，简称“贞元六书”。这六部书，是冯友兰一生哲学创作的高峰，也是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为民族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用冯友兰的话来说，这六部书，实际上是一部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

为联大编写校歌歌词

早在西南联大成立初期，为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10月，经西南联大第89次常务委员会决议，聘

经历十多天的海上之行，在紧张、疲惫和喜悦之中他们终于盼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邓初民在日记中格外认真地记录了彼时的心情，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中国的热切期待和满怀激动：“到今天为止，整整走了十一日夜，共二百六十四个小时，这时已看得见大连港口了，行将踏上已被解放了的自己祖国的土地，亲眼看到新民主政权的一切，并享受新民主政权下的各种民主自由幸福，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而且这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也就是说来参加新中国的创建的，尽管我不是什么重要的，只算得整个新中国建设里面的一块砖、一片瓦，但也应尽所担的责任。”

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新政协召开前期的工作。

协商建言：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2月23日，邓初民与在东北的35位民主人士乘坐“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出发，于2月25日中午到达北平。罗荣恒、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及民主人士100余人到车站迎接。邓初民一行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

不久，在中共的安排下，邓初民与郭沫若、许德珩等一行40人组成中国代表团，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们于3月30日出发直到5月25日近两个月时间才回到国内。回京之后，邓初民便立刻投入到众多繁忙的公务之中，其中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最为重要，也是推动和联系其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为期5天。6月19日结束会议当天，会议临时主席周恩来提出谁还有临时动议，邓初民站起来，提议应由大会名义通电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敬。他的动议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在沈钧儒、许德珩的建议下全场起立向两位致敬。这个瞬间被《人民日报》的记者捕捉到，写成了通讯《“全体起立，向人民的领袖致敬！”》——新政协筹备会休会前二十分钟速写》，刊发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联大撰写纪念碑文

西南联大在1946年6月宣布结束，三校依依不舍地离开云南。冯友兰又为联大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碑文1000余字，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记述了联大创办的始末及其特点，完全归功于整个民族及哺育这个民族成长的伟大文化。这也正如冯友兰在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贞元六书同联大校歌歌词、联大纪念碑碑文一起，成为冯友兰为西南联大乃至中华民族所树立的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文人逸事

鲁迅的无所谓

顾燕

一般作家对于自己的手稿都十分珍惜，但鲁迅不一样，鲁迅在这方面无所谓，手稿随意处置，并不看重。许广平在《关于鲁迅的生活》一书中所说：“他对自己的文稿并不爱惜，每一书出版，亲笔稿即行弃掉。有时他见我弃掉的保存起来，另一回我就见他把原稿撕碎，又更加以讽刺，说没有这么多的地方好放。其实有许多不大要紧的书，倒堆在那里，区区文稿没有地方放？不过他不愿保留起来就是了。”“不愿保留”这才是鲁迅的个性。

鲁迅从来没有刻意地保存过自己的文稿，可能从内心觉得没有必要。

得以存留下来的文稿都是别人，特别是许广平背着他保存下来的。在这方面，许广平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鲁迅一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重要，这从他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鲁迅1936年10月19日逝世，在他去世前的1936年9月5日写下了题为《死》的一篇杂文，其中就涉及到类似遗嘱的文字，如：“二、赶快收殓、埋葬、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让世人忘记自己，这是鲁迅的初衷。

不认为自己重要的人，恰恰世人记住了他。这就是鲁迅。

许地山的“爱情公约”

周惠斌

著名作家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5月1日，他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周俟松在北平（今北京）中山公园来雨轩举行婚礼。婚后，许地山潜心著译、教学，周俟松负责家中事务，虽然生活平淡无奇，却也甜蜜美满、缱绻情深。

1933年秋，许地山偕夫人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后绕道台湾探亲。期间，两人发生争执、互不相让，周俟松一气之下返回到北平，许地山则前往印度考察宗教。在印度，许地山不时回忆起与周俟松4年相依相伴的婚姻生活，不禁愧疚于心，于是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提出解决婚后矛盾冲突的《爱情公约》：“一、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二、如意见不合，在大声说话前，各自离开一会儿；三、各自以诚相待；四、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精神和肉体的愉快；五、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六、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事。”朴实中不失诙谐。“公

约”下方，用小字标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于印度”。许地山回国后，发现周俟松已将“公约”高悬卧室。从此，两人按“约”办事，共同遵守、相处融洽，用浪漫的“爱情公约”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而且善于用幽默化解生活中的各种小摩擦，琴瑟相和、再无争吵。

1935年，许地山应邀前往香港大学任教，全家因此迁居香港。一天，许地山按照约定时间到商场接妻子回家，周俟松却因购物砍价而迟到。许地山没有责怪妻子，风趣地说：“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是我没有吃亏。”

许地山不会开车，每每外出，周俟松就是他的专职司机。许地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抚摸着自己的山羊胡子，总是不无自嘲地说：“夫人掌控大局，在下无忧无虑矣”“副驾驶位置就是副职嘛……”每逢此时，周俟松的嘴角总会笑意荡漾……

冯牧的眼光

王剑

冯牧发现和扶植文学新秀的事，在文学界被传为美谈。

冯牧早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期间，就发表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还撰文推荐了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4年，他读了马烽的小说《张福元的故事》后，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大大提升了这位“山药蛋派”主要成员的自信心。

20世纪50年代初，冯牧到昆明军区工作，发现、扶植、培育了徐怀中、公刘、白桦、彭荆风、周良沛等一大批作家。他指导他们如何观察生活、如何借鉴名著、如何深入基层。他带领这帮年轻人深入边疆地区，体察民情、收集素材，这才出现了《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等具有边地风情的名作。

到北京工作后，冯牧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浇花除草”。要多关注那些在“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要为他们的成长“鸣锣开道”。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刊出后，引

发争议。冯牧特意撰文，称“这是一篇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好作品”，并由此认定蒋子龙是一位“严肃的、有才能的作者”。1982年，《十月》杂志编发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冯牧一读，被小说中的真切生动所吸引，当即写下《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一文，表达了对当时并不知名的部队青年作者李存葆的喜欢。

冯牧对于从最基层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也关爱有加。1983年，冯牧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对史铁生的评论。那时的史铁生还是一位不为许多人熟知的作者，但冯牧却从他“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并不多见的‘才华’的闪光”。认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必将成为他在文学征途上继续奋力攀登的一个可喜的标志和一个新的起点”。

2000年2月，冯牧文学奖设立，专门用于表彰青年批评家、文学新人和军旅作家。此奖的初衷，无疑与冯牧发现和奖掖青年作家的伯乐精神一脉相承。

刘海粟高龄撰写墓记

周星

1983年冬天，刘海粟回到家乡常州武进，参加清代著名书画家恽南田诞辰350周年纪念活动。他兴致勃勃地为恽南田纪念馆揭幕剪彩，瞻仰了修葺一新的恽南田陵园，心情格外好。

在他离开常州的前一天晚上，当地书画名家承名世、蒋凤白等人拜访他，请他为新修的恽南田陵园写个墓记。他听后欣然同意，并称恽南田画风高雅、人品高洁，值得后世子孙纪念学习。

1984年夏天，武进县政府派文化部门负责同志与他面商重修恽南田墓的事。刘海粟说，去年说过这事，一直挂念在心，不曾忘却。不过这件事很重要，必须要反复斟酌，方能下笔。他告诉武进县的同志，准备

本年度秋季在青岛撰写康有为墓志铭时定稿。

这一年的8月中旬，武进县文化部门负责人赶到青岛，刘海粟夫妇热情接待了家乡的客人，并把《重修恽南田墓记》盖上印后赠送给对方。《墓记》全文一共153字，概括介绍了恽南田的生平和成就，主旨是“缅怀先贤，激励后来”。刘海粟还强调，恽南田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他的没骨花卉画是举世公认的，他的山水画得宋元诸家之精髓，“力道雅韵，超迈绝伦”，这一点必须要突出让后人知道。

如今，刘海粟撰写的《重修恽南田墓记》依旧还矗立在恽南田陵园中。